

新编

五四运动史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XINBIANWUSIYUNDONGSHI

张德旺◎著

新编

五四运动史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五四运动史/张德旺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 - 7 - 207 - 08259 - 6

I. 新… II. 张… III. 五四运动(1919)—史料 IV. K261.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6520 号

责任编辑: 朱佳新

装帧设计: 韩 冰

新编五四运动史

Xinbian Wusiyundong Shi

张德旺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神龙联合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0

字 数 600 千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8259 - 6/K · 978

定 价 6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目 录

引言——从 90 多年五四运动史整体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说起	(1)
第一章 五四运动的国际背景	(11)
一、日本霸占山东并企图使之合法化是直接动因	(11)
二、朝鲜三一运动提供行动楷模	(16)
三、美国客观上主要起促发作用	(23)
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指出新发展方向	(29)
第二章 五四运动的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	(35)
一、五四运动的经济背景	(35)
二、五四运动的政治条件	(38)
三、五四运动的社会基础	(43)
四、五四学生运动的预演	(51)
第三章 新文化运动兴起	(57)
一、《新青年》创刊	(57)
二、北大改革	(66)
三、文学革命的兴起	(71)
四、新闻改革的发端	(75)
五、青年社团热潮	(80)
六、封建顽固派对新文化运动攻击及受挫	(89)
第四章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	(95)
一、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无理决定	(95)
二、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幻想彻底破灭	(103)
三、五四游行,火烧赵家楼	(108)
四、北京学联成立和营救被捕学生	(113)

五、蔡元培出走	(117)
六、北京学生总罢课	(120)
第五章 各地民众响应北京学生的斗争	(129)
一、天津:各界奋起 京外枢纽	(129)
二、山东:最早抗争 广泛动员	(132)
三、武汉:学子英勇 洒血为国	(135)
四、广东:响应迅速 发动全面	(138)
五、江苏:紧随京沪 城乡联动	(140)
六、浙江:学联得力 “三罢”显威	(143)
七、安徽:动员充分 坚决抵货	(145)
八、江西:广泛发动 讲究策略	(146)
九、长沙:勇抗高压 重视舆论	(149)
十、四川:成渝并起 抵货潮猛	(151)
十一、其他地区:波澜起伏 连绵不断	(153)
十二、海外各地:同仇敌忾 心向祖国	(161)
第六章 六三运动和六五运动	(163)
一、中外反动势力对北京爱国运动的镇压	(163)
二、六三运动——北京学生大批被捕坚持抗争	(165)
三、六五运动——上海“三罢”斗争	(170)
四、上海“三罢”斗争的发展	(177)
五、六三运动、六五运动的突出特点	(184)
第七章 中国拒签巴黎对德和约	(190)
一、北京政府对签字问题的方针	(190)
二、新文化领袖人物对爱国运动的指导	(192)
三、全国学联和其他爱国群众团体的建立和发展	(198)
四、全国各界民众及海外侨胞奋力抗争	(203)
五、中国使团拒签对德和约	(207)
第八章 五四爱国运动深入发展	(214)
一、反对日本扩大侵略权益的斗争	(215)
(一)反对日本压迫中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	(215)
(二)山东人民同日本侵略者直接抗争	(217)

(三) 全国强烈抗议“闽案”	(219)
(四) 反对日本侵夺中国洛潼、南浔路权和盗买郑州	(222)
(五) 反对日本领事干涉天津商会选举	(224)
(六) 反对日本侵占珲春	(226)
二、反对封建军阀斗争	(228)
(一) 反对马良祸鲁	(228)
(二) 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	(231)
(三) 湖南驱张运动	(233)
(四) 天津“九一念九”斗争	(236)
(五) 浙江“一师风潮”	(239)
(六) 安徽六二学潮	(244)
第九章 新文化运动横广推进和深入发展	(249)
一、新闻事业的改革	(249)
二、文学革命的发展	(253)
三、“整理国故”的成就	(259)
四、教育改革多方面发展	(266)
第十章 西方新学说新思潮广泛传播	(272)
一、杜威来华讲学及其实用主义传播	(272)
二、罗素来华讲学	(280)
三、无政府主义思潮蔓延	(292)
四、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传播	(301)
第十一章 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	(308)
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系统传播	(308)
二、国民党人的积极传播	(321)
三、研究系的热情介绍	(326)
四、其他传播	(328)
第十二章 文化保守主义兴起	(333)
一、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派	(333)
二、章士钊的新旧文化调和论	(337)
三、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的发表	(340)
四、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	(343)

五、张君勱挑起“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346)
六、学衡派对新青年派的批判	(349)
七、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评价	(353)
第十三章 社会改造的思想论战	(358)
一、问题与主义论战	(359)
二、关于社会主义论战	(366)
三、反对无政府主义论战	(374)
第十四章 中国社会改造的实践尝试和奋斗	(381)
一、昙花一现的工读互助运动	(381)
二、妇女解放运动的新进展	(387)
三、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	(392)
四、“驱彭挽蔡”运动	(396)
五、联省自治运动	(399)
六、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大波澜	(402)
七、现代工人运动的兴起	(412)
第十五章 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	(419)
一、《新青年》编辑部分裂	(419)
二、少年中国学会分裂	(423)
三、从《觉悟》右转到北大新派教师分裂	(428)
四、分化结局	(434)
结语：五四运动的总体评价	(436)
一、关于五四爱国运动的领导权	(436)
二、关于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	(438)
三、“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和主导思想	(442)
四、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445)
五四运动大事年表	(451)
主要参考书目	(461)
后记	(469)

引言

——从 90 多年五四运动史整体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说起

五四运动既是近现代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又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运动,是中国全面融入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现代化大潮的起点。其总体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按研究主体分类,有已故美籍华裔学者周策纵教授提出的自由主义、保守的民族主义、共产党人三个系统^①。笔者浅见,按内容特点划分,90 多年这三个系统形成了三种五四运动史整体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下面对此予以简略评析,以利尊敬的读者对本书内容的全面把握。

一

一是重视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密切联系的整体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其代表性著作有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胡华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②;华岗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卷·增订本)》^③,稍后扩充其“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五四运动”一章成《五四运动史》一书;李新、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④等。这些论著关于五四运动论述的共同点是:

1. 五四运动的国际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经济基础是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民族工业的发展;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的迅速壮大;思想条件是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是运动爆发的导火索。

2. 五四到六三之前,运动中心在北京,学生是运动的主力军;六三后运动中心相应转移到上海,工人阶级是运动的主力军。以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一批赞

① 参见[美]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十四章“结论:对五四运动的各种阐释和评价”。

② 胡华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人民出版社 1952 年 3 月版。

③ 华岗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卷·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1 年版。

④ 李新、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9 年版。

成十月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运动中最先进最有战斗力的左翼。

3. 五四爱国运动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各种新学说新思潮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战胜了实验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干扰,广泛传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4. 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开始的大革命;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①

这个叙事体系完整全面地体现了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的理论思路,并且还有某些突破,如提出六三后工人成为五四运动的主力军,其政治大罢工是五四运动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或最重要的因素;提出“只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才能自始至终深入人民群众去领导革命,才能统帅统一战线中各种友军去和封建势力及帝国主义作斗争”^②。

以上重视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肯定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密切联系的整体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构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历史基点之一,吸引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在继承发扬五四运动优良革命传统的旗帜下投身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洪流,这实际也是瞿秋白、毛泽东等提出这种理论思路的初衷。这种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对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同时活跃于五四运动中的国民党人、英美派知识分子、研究系等各政派略而不提甚至有所贬低,“一些与自由相关的思想,如个性主义、思想自由等,则被淡化,甚至忽视”^③。从历史科学的角度考察,这不能不说是明显的缺憾;从长远看,也不利于中国人民全面借鉴汲取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以积极推进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进程。

“文革”十年动乱结束后,在中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大潮中,大陆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学界进行了有关五四爱国运动整体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的多方面、多角度、多方法的探索和研究,迅速出版了一批有关五四运动整体研究的论著。其代表性著作有: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1983),彭明著《五四运动史》(1984),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中邓野执笔的“五四运动”一章等。其共同要点是:

1. 五四运动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和新知识阶层力量的壮大;思想基础是新

① 参见胡华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华岗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卷·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华岗著:《五四运动史》,海燕书店1951年版;李新、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

② 华岗著:《五四运动史》,《华岗选集》第二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2页。

③ 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与五四传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阐释》,《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8页。

文化运动的兴起,特别是《新青年》杂志和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密切结合;直接预演是京津和留日学生抗议中日防共军事协定的请愿活动。

2. 六三后,中心是上海,学生和工人构成运动两大主力军^①。取得惩办卖国贼和拒签和约胜利后,运动继续发展为抗议“鲁案”、“闽案”等斗争至1920年5月前后。

3. 学生领袖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匡互生、许德珩、刘清扬等发挥了突出作用;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孙中山、梁启超、张东荪等积极促发、支持、指导了运动的发展。

4. 爱国运动促进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经过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论战,经过工读互助团等实践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的社会主义道路,新文化统一战线逐渐分裂。

5.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第一次冲破封建主义禁锢的思想解放运动。

可见,这种整体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与“文革”前相比,已明显呈现出既坚持原来的重视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等基点,又努力克服对国民党人、英美派知识分子、研究系等各政派略而不提甚至予以贬低,对“个性主义、思想自由等”思想“淡化,甚至忽视”等偏向,努力全面重建五四运动历史真实的明确方向。

二

二是以国民党人为中心的整体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最早构建这种总体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的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包尊彭著《五四运动史》等,其内容要点是:

1. 五四运动的历史渊源是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改良两大历史潮流,特别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政治背景是二次革命后,蔡元培、胡适、吴稚晖、高一涵、陈独秀等总结二次革命失败原因存在于人们思想太旧而进行的思想启蒙。

2. 促发运动并发挥领导作用的是国民党人及与国民党联系密切的人或社会团体。其代表人物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王正廷、顾维钧;北京学生中的罗家伦、傅斯年等;上海运动是邵力子带头引起,学联主要是程天放起主导作用;上海工人已信仰三民主义,由国民党组织的工会领导罢工。

3. 五四运动为抗日战争铺平了道路。^②

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学者实际沿着这个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深入研究,以刘永明著《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为代表作。其主要观点如下:

^① 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页。

^② 参见包尊彭著:《五四运动史》,(南京)青年出版社1946年再版。

1. 国民党人是五四运动的主要促发力量。运动的“思想主题”是孙中山“全民政治”的“新思想”。国民党人——“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对“掀起五四运动”的“北大革新团体”国民社、新潮社等有着“内在的团体领导关系”^①。陈独秀是在蔡“重用和帮助下”“日益成为北大教员中的革新派领袖，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李大钊与国民党人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陈、李的活动“很有益于扩大国民党在北方的影响”。^②

2. 国民党人或与国民党接近的人是五四学生运动的主要指导者、组织者。五四游行示威中散发的许德珩、罗家伦分别起草的《北京学界天安门大会宣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均宣传了“国民党人政治主张的核心内容”。五四被捕“学生得以获释，也是国民党人在政治上的小胜利”。^③ 上海国民大会事务所“实际上正是国民党人组织上海五四民众运动的指挥部”，通过它，国民党人“始终向全国人民提出的主要战斗目标”即“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翻由日本走狗组成的北洋军阀政府”，“因有这种指导”，“运动得以顺利发展，得以取胜”^④。“上海学生联合会是在国民党人鼓动、指导下成立并开展爱国活动的。其成立后，配合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作了很多工作”；“上海学生联合会准备领导上海学生实行总罢课，乃是在切实执行国民大会的决议，也就是按照国民党人的意图行事”^⑤；程天放起草的《〈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发刊词》“是阐明上海学联及其日刊宗旨的。概括其内容，无非是说，只有国民党人的全民政治理想，才是救中国贫弱的唯一良药；爱国学生首先懂得了这一点，才努力唤醒农工商各界民众”，“学生开展爱国运动，是受到国民党人政治影响的结果”^⑥。“全国学联成立后，在最初几年中，始终接受国民党人的指导”^⑦。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是“旨在根据国民党人的全民政治原则，组织一个全国性的民意机关，代表国民公意进行国民外交，处理内政事物，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政权机关。这就与国民党人当时主张的另起锅灶、组建新政府配合默契了”。^⑧

3. 国民党人或与国民党接近的人是上海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到6月决战时期，国民党人更加努力去鼓动、组织大罢工。事实表明，从6月5日开始的上海工人大罢工，正是他们坚持努力奋斗的直接结果”^⑨。

4. 国民党人是上海商界罢市的主要领导者。国民党人在上海五四商人运动

① 刘永明著：《五四运动与国民党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刘永明：《五四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

② 《五四运动与国民党人》，第42～43页。

③ 《五四运动与国民党人》，第101～105页。

④ 《五四运动与国民党人》，第113页。

⑤ 《五四运动与国民党人》，第166～170页。

⑥ 《五四运动与国民党人》，第184页。

⑦ 《五四运动与国民党人》，第198页。

⑧ 《五四运动与国民党人》，第203页。

⑨ 《五四运动与国民党人》，第220页。

中主要做了三件事:(一)鼓动上海商业工团联合会努力奋斗,热心救国;(二)组织平民商会,深入开展五四商人爱国运动,而“平民商会,实际由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汇总而成”; (三)通过鼓动、指导上述两团体,带领绝大多数爱国商人同反动的上海总商会作斗争,并促进其改组。^①

5. 国民党人是拒签和约斗争的主要领导者。“汪精卫、李石曾等国民党人乃是旅法华人开展拒约等爱国斗争的主要领导人”,“巴黎和约签字日,国民党人积极组织巴黎的留学生和華工,准备武力拒约”;是对拒签和约“最直接而最有效地推动”;“巴黎和约得以拒签,乃是汪精卫等人鼓动、组织旅法华人誓死抗争的结果”。^②

针对刘永明等上述国民党人是五四运动主要领导者的观点,一些学者提出刘永明等夸大拔高了国民党人的作用。但争论双方的共识是大陆史学界长期沿用毛泽东、蔡和森关于国民党人在五四爱国运动中“靠边站”的观点不符合历史实际;国民党人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以胡适为代表的亲英美派知识分子、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同为对五四运动发展最具影响力的重要政派。^③

三

三是以学生运动为中心、以自由主义为主导思想的整体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集中体现于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其主要观点是:

1. 五四运动促发条件中最重要的,一是“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和随后发生的事件所激起的民族屈辱感”,抵制日货在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中“第一次表明了这个武器在被众多的人使用时所具有的巨大威力”。^④

二是“海外留学生的改革热情”。“19、20 世纪之交”,日、美、法“三个国家成了对中国影响最重要的中心”,留学生“回国之后,通过他们所提倡的不同的、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法”,显示了这些国家“不同的影响”。其中,胡适等新知识分子主张“不愿意支持一场革命和提倡把教育作为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基础”,体现了美国的影响。“留日学生比在任何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受到更多的军事、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还“向中国输入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抗议二十一条归国的留日学生 1906 年在上海成立的各省旅沪学生总会“是现代中国学生大联合的创始”,“是近代中国学生在全国范围团结起来,关注中国社会、文化

① 《五四运动与国民党人》,第 260~270 页。

② 《五四运动与国民党人》,第 378~383 页。

③ 参见刘永明:《五四运动中的国民党人》,《中共党史研究》1989 年第 3 期;刘永明:《五四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 6 期;张德旺:《如何评价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与刘永明、黄金华等商榷》,《中共党史研究》1990 年第 2 期;张德旺:《五四运动中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若干问题再探讨》,《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3 期等。

④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 22~27 页。

和政治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五四事件’后成立的各种积极活跃的学生联合会的前奏”。法国影响表现在“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思想”“影响了相当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者,如梁启超、陈独秀和许多国民党领导人”;还表现在“到了大战后期,他们的一些领导人便采取了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一种或几种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法国回国的工人和学生带回了新的经验和新的思想”,“不少人在20年代初期把五四运动推向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极端是起过作用的”。^①

2. 关于五四运动发展过程、各阶层群众及其社团组织的作用。运动的开始阶段是“初期的文学和思想活动”;1919年5月6日成立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是中国第一个全市范围内中等以上学校的永久性学生组织,它成了随后几年在几乎所有中国重要城市中成立的众多类似组织的典范”;“一个月以后‘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成立,“成了全国学生生活的司令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男女学生在一起集会”。^② 蔡元培出走后,“教师和教授们仿照学生联合会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不仅包括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的追随者,也包括那些不愿意参加或实际上反对新运动的人”,“教师和教授们实际上是在追随学生们的行动”。^③ 上海学联5月27日决定派人联络商界和工人,6月4日“收到从天津发来的有关北京大逮捕的消息立刻掀起了更强大的争取工商界支持的运动”。6月5日,上海实现罢市并迅速扩展到郊区;接着工人罢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性的爱国的罢工,工人罢工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而是对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它标志五四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④

3. 五四运动中的外国影响。日本政府持敌视立场,“从一开始就对中国人因二十一条而产生的反日情绪极为恼火”,从运动开始就“宣称,学生运动是由美国支持的”,“是美国驻华公使煽动和资助的”;^⑤包括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英国公使朱尔典、法国公使庞皮以及在华的杜威、罗素等人都对中国学生持同情态度,特别是“芮恩施开始成为中国青年的最热心的支持者,他相信这些青年是在为民族自由和新生而战”;但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在罢市、罢工发生后却执行了高压政策。^⑥

苏俄在1920年3月“这个关键时刻”,通过加拉罕宣言“提出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签订的所有秘密条约及其他不平等条约,无偿放弃俄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和利益”,“深刻地影响了五四运动潮流的趋向”。^⑦

①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1~46页。

②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170~172页。

③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170~189页。

④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193~215页。

⑤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77~280页。

⑥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81~289页。

⑦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91~297页。

4. 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新知识分子中的自由主义者、左派分子和国民党、进步党部分党员中“拥护民族思潮的分子”。自由主义者有蒋梦麟、陶知行、张慰慈、高一涵、陶孟和等,其中胡适“对自由主义和西方民主主义理论”“表述得最清楚和最有广泛读者”。左派分子“包括鼓吹极端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激进派”,“理想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其中陈独秀、李大钊等“直到‘五四’时期中期才转向”马克思主义方向。“国民党中对新知识分子和学生最有力的领导人是孙中山、蔡元培、吴稚晖、胡汉民、戴季陶、叶楚傖、沈定一(沈玄庐)、邵力子、朱执信、廖仲恺等,在‘五四事件’发生时,他们大多具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进步党领导人有梁启超、林长民、张东荪、蒋百里、张君勱和蓝公武等。^① 这个新文化营垒在“五四事件”后迅速出现了“思想和政治上的分裂”。首先表现为问题与主义论战等思想上的分裂,接着表现为“社会政治活动论与文化活动论的对立”;继而在参与政治的行动上出现了相应的分化;其后“基于对北京政府的不同态度以及对社会政治、文化改革和对革命的不同愿望”,“自由派和保守派徒劳地要求在军阀统治下实行温和的改革”,“左派分子和民主主义者在苏俄与日俱增的影响下加速了他们的组织活动”,终于使《新青年》编辑部、《新潮》编辑部、《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等著名新社团相继公开分裂。^②

5. 五四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实用主义(又称实验主义)。当时“17世纪以后西方各种思想”都汇集于中国,但“在‘五四事件’后的一段时间,实用主义者实际占据了我国自由阵营中的领导地位”,“总起来可以这样说,在五四运动初期,实用主义怀疑论和未知论是改革者批判传统伦理和思想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直到20年代中期以前,这些方法并没有受到来自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的有力竞争”。^③ 五四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开始”阶段,“1916和1918年时,李大钊的论述显示了某些与‘生成方法’相对立的辩证法的萌芽。但在当时那样的早期阶段,在李大钊的著作中尚看不出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919年5月李大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批判性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引者),事实上他基本上对之持同情态度”;“1923年后,辩证唯物主义开始为某些中国作家所接受,20年代后期开始它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④

与前述重视俄国十月革命背景,肯定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密切联系和以国民党人为中心的两种整体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相比,周策纵的整体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具有史实较为全面、材料较为扎实、分析较为深入的突出优点,但还

①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305~307页。

②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304~348页。

③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409页。

④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409~412页。

有值得商榷或进一步探讨之处:

1. 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周策纵断言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表达的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态度”似有误。因为如丁守和所论,“李大钊一九一八年所写的几篇关于十月革命的著名论文(《法俄革命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容还没有进行系统的介绍”,“从其内容来看也有些不够恰当的地方,但它们却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观点”。^①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前后,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上还发表了《阶级竞争与互助》、《再论问题与主义》等论文,明确宣布“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②。与此相应,周肯定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1920年3月加拉罕声明传入中国后才起作用,也与实际有明显距离。实际《新潮》1919年1月出版的创刊号就有罗家伦、傅斯年热烈欢呼俄国十月革命;同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进一步强调了五四运动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密切联系。

2. 实用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始终居主导地位。周策纵称“在五四运动初期,实用主义怀疑论和未知论是改革者批判传统伦理和思想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直到20年代中期以前,这些方法并没有受到来自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的有力竞争”似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1919年7月“问题与主义”论战中,李大钊明确提出要“谈布尔什维主义”、主张中国社会应“根本改造”,就是公开亮出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旗帜,表明了与胡适改良主义的鲜明对立。陈独秀在1919年6月11日起草印制散发的《北京市民全体宣言》中明确提出对中国社会“根本改造”;翌年8月发表的《谈政治》等论文中旗帜鲜明地公开主张中国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新青年》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马克思主义在稍后同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更迅速扩大了影响;还能说实用主义没受到挑战吗?

四

上述三种五四运动史整体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中,以第一、第三种影响较大,分别居中国内地、西方各国及港台学界的主导地位;后两者均从一开始就有同第一种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学术争鸣的鲜明意向。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世界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大趋势日益明朗不可逆转,中国全方位改革对外开放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的关系逐渐进入历史新阶段,三种整体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的学术交流乃至思想碰撞日益频繁密切全面深入,实际使建立一个更加真实、全面的五四运动史总体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的任务摆在五四学者

① 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62页。

②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8月7日。

面前。

叶文心 1999 年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 8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她说:“无论中西,叙述五四时的主要着眼点都是北京,以北大校园一批新式知识分子所鼓吹的新文化思想为线索,连系到新人物对西式民主科学的向往、民族自决原则的渴望、大学生爱国行为的兴起、对传统伦理及权威的反抗,以及社会主义思潮的蓬勃、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种主导叙述形态突出了五四运动在革命史上的意义,淡化了五四在文化史上的作用,突出了自外引来的世界性思潮在北京知识阶层精英分子之间所发挥的作用,淡化了中国思想传统在全国各地不同的环境之中推动变局的潜在能力”;“五四运动当年在各地城乡之中多元多样的呈象,以及新文化建构与旧思潮传统之间的冲击回荡,因为没有得到正面审视,也就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之外了”;“现在急需重新在新的史学研究基础上进行建构”。^①

这些见解可谓道出了当代五四运动史学者的共同心声。当代五四运动史学者,特别是中国内地的学者,尤应在构建比前贤更真实、更全面的五四运动史整体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上有所作为。

所谓“更真实”,主要是指要努力排除研究中的非学术化倾向,真正做到最大限度地搜集史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进行审慎的鉴别整理,去伪存真、取宏用精;同时做到正确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以对历史真实的最大限度恢复重建和历史规律的深入揭示提供对现实的借鉴,而不以现实的需要而扭曲、剪裁历史。

所谓“更全面”,主要是指要全面地展示运动的各阶段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的地位作用及其内在联系。叶文心前述不但要关注北京、新思潮,还应关注“五四运动当年在各地城乡之中多元多样的呈象”,关注“中国思想传统在全国各地不同的环境之中推动变局的潜在能力”,“以及新文化建构与旧思潮传统之间的冲击回荡”的观点就很有见地。

对于中国内地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构建比前贤更真实、更全面的五四运动史整体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的关键是彻底遵循唯物史观的原则,以世界眼光、时代精神,实事求是地科学评价运动中的学说、思潮、党派、团体、人物等,并进一步总结这一时期政治运动、文化发展、中外关系乃至社会转型等历史经验。同时要正确对待 90 多年的研究成果,无论任何论著,只要多少有一点点参考价值,均要放手吸收。据此,笔者对叶文心提出的五四研究“从前一贯主导的模式”已经“解体”的观点^②不敢苟同。因为所谓至今“一贯主导的模式”即本文前述之第一、三种整体研究思路叙事体系。如前所述,它们确实因种种难以避免的历史的、现实的、客观的、主观的等种种因素制约,各有某些不足,但总体上都经过长期积累,主体坚实各有千秋;

^① 参见叶文心:《史学研究五四运动在杭州》,欧阳哲生、郝斌主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下),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97~1113 页。

^② 《史学研究五四运动在杭州》,《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下),第 1113 页。

特别是中国内地马克思主义学界在“文革”后已经表现出民主开放、求真求实的气象。何以断言这两个叙事体系已经“解体”？新的五四运动史整体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的构建绝非建立在“从前一贯主导的模式”“解体”的前提下，而是在它们的基础上继续努力。

本书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整体思路和叙事体系是：

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始终把主要斗争锋芒指向妄图霸占中国山东并使之合法化的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奴仆——中国的亲日派皖系军阀、政客；同时反对支持、纵容日本、亲日派军阀的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政客。这场运动继承发扬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优良传统，经历了由1915年反对中国被迫签订“二十一条”到1918年反对中日两国签订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酝酿、预演；到1919年“五四”猛烈爆发至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出席凡尔赛宫对德和约签字仪式的高潮阶段，取得了罢免曹章陆和拒签对德和约两大历史性成果；之后继续向着密切联系着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权益、反对封建军阀卖国专制两个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的方向深入发展，不仅直接捍卫巩固发展了前一阶段成果，而且推进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觉醒，实现了中国近代以来革命主体的结构性调整，开始了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阶段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历史性转变。

作为文化运动，是指在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前后的整个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矛盾都是封建主义腐朽文化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新文化的矛盾，文化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封建主义腐朽文化，文化发展面临的历史任务是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全面转型。“五四”前，新文化营垒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主要思想武器，向长期禁锢中国人民思想的封建主义文化堡垒展开了猛烈进攻，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思想。“五四”后，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迅猛发展，中国出现了空前开放、自由的古今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千说竞起、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特别是围绕“中国社会如何改造”等问题展开了多重思想论战，多种实践探索。实验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等各种新学说新思潮龙腾虎跃各呈芳华，马克思主义则因为适应根本改造中国的迫切需要而逐渐取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居于新文化发展的主导地位。

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有机结合，构成了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起点，中国文化面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的崭新开端，中国社会全面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划时代的辉煌里程碑。